

顾长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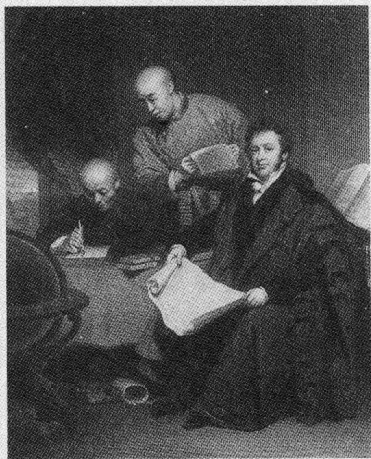
#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顾长声 著



#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长声著. —4 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0849-3

I. ①传… II. ①顾… III. ①基督教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8839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封面设计 王晓阳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顾长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7.5 插页 4 字数 376,000

2013 年 1 月第 4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849-3/K·1906

定价 55.00 元

# 序言

陈旭麓

宗教不受海洋和疆域的限制。世界三大宗教从公元1世纪起都先后传入中国，最早是佛教，其次是伊斯兰教，后来是基督教。佛教传到中国产生了许多“高僧”，产生了中国自己的各派佛教哲学；伊斯兰教成为回族、维吾尔族等我国少数民族特有的信仰，自成一体；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则自16世纪中叶开始来到中国，频频活动，历200余年，至19世纪初期，基督教(新教)的布道者相继踏上中国大陆。随之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狂暴袭来，摧毁了中国的固有防线。传教士乘势涌入，上下渗透，步步推进，公然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按行政区划分设教区，深入到各个城镇和村落，变外来为内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

显然，西方传教士的来到中国，与早年传入中国的那些宗教的时代大不相同了。他们虽然也有利玛窦、马礼逊、李提摩太、丁韪良、司徒雷登等大批著名传教士，但是除了前期的利玛窦等有较多的宗教气质外，从鸦片战争起涌入中国的传教士，已看不到“高僧”的形象，即使他们中有人自称中国为其“第二故乡”或“半个中国人”，也大都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中国人民久已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是因为：资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必然要利用富有欺骗性的传教士作为侵略爪牙；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但需要利用宗教统治本国人民，而且需要把这种统治方式向国外延伸，决不是传教士发什么“善心”所能改变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是神学的婢女，那么到了近代中国，他们的神学就成了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这个事实，也就使中国人民必然要把反洋教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要揭穿他们的伪

善及其罪行。

然而，传教士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与中国的封建文化是有先进和落后之别的。为了侵略和传教，他们既不满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又要同封建势力相提携；既要阻止中国的革命，又要用西方科学文化作媒介。所以，他们对近代中国的革新和改良也有所赞同，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则极端敌视，横加干涉。这些情况，说明了他们在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急剧演变中有过这样和那样的作为，而他们掀起的无数风浪，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斑斑创伤，却是谁也不能抹杀或改变的事实。但也不可否认，他们既是传教士，还是有传播宗教的一面，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信了教，吃教和仗势的恶棍毕竟是少数。

一百多年来，我国对西方传教士的行径，有很多记载，也有着很多亲历，却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写出一本较为系统、完整的专著，看到的只有教会及有关人士宣扬《中华归主》一类的传教史和教士传记。

1977年12月，顾长声同志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我们多次谈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谈到史学界久已提出应写而没有写的“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史”。他熟悉教会历史，带着责任心毅然承担了写这本书的任务。在撰写中，改用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为题，以其更能说明近代中外关系中的这个特殊方面的内涵和外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日录夜作，五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本约30万字的书，填补了中国近代史著中关于传教史的一个空缺。在五稿中，我读过三稿，觉得这本书依次写来，取材典型，文无窒碍，不是近代史加传教的泛论，而是一本有鲜明个性的历史著作：

一、以传教士东来的梗概作序曲，然后较为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迄1949年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过程，并以传教士自身的活动所构成的段落为章目，既能首尾一贯，重点又较集中。

二、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对他们参与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种种行为，进行了有机的论述。

## 序言

三、在铺叙众多传教士和史实的同时，对几个较有代表性的传教士、教案、教会学校和广学会那样的出版机构，又着重作了介绍和分析，一般中有特殊，更能显示出教会势力的各种关联和影响。

四、全书从事实出发，史料大多取之于传教士的论著和传记及外国人写的传教史，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和言论，现身说法，再以中国的记载印证，一洗不切实际的浮夸之词，给人以信史的感觉。

这本书的问世，无疑将丰富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内容，作为“传教士与中国”的专史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开端，它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蓝图。

(1980年6月)

## 目录

序言 陈旭麓 / 1

### 第一章 传教士的东来 / 1

- 一 利玛窦身穿儒服上北京 / 1
- 二 俄国达喇嘛进驻“罗刹庙” / 15
- 三 广州外国商馆里的“新客” / 19

### 第二章 大炮在天朝呼啸 / 41

- 一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 41
- 二 从中法《黄埔条约》到“给还旧址交涉” / 47
- 三 “传教宽容条款”被塞进不平等条约 / 52

### 第三章 “洋兄弟”与中国起义者之间 / 61

- 一 从《劝世良言》的启示到罗孝全的说教 / 61
- 二 “洋兄弟”来到了太平天国 / 67

### 第四章 传教团体的组织和活动 / 85

- 一 天主教修会 / 85
- 二 基督教差会 / 93
- 三 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 / 101

### 第五章 教案——谁是被告? / 106

- 一 “劝人为善”怎会激起民众公愤? / 106
- 二 重大教案记略 / 114
- 三 对三个典型教案的考察 / 119

**第六章 “广西国之学子中国” / 132**

- 一 广学会的成立和它所宣传的西学 / 132
- 二 李提摩太对维新运动的直接干涉 / 148
- 三 从“孔子或耶稣”到“孔子加耶稣” / 156

**第七章 在脱去道袍之后 / 164**

- 一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 / 164
- 二 八国联军中新来的“军官”及其暴行 / 167
- 三 “对中国该如何处置?” / 177
- 四 “唯一根治的办法是迅速传播基督教” / 182

**第八章 传教士开办洋学堂 / 188**

- 一 洋学堂在中国的发展 / 188
- 二 早期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一瞥 / 195
- 三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华教育会 / 199
- 四 同文馆里的洋教习 / 202

**第九章 “为基督征服世界” / 206**

- 一 教会势力的大发展 / 206
- 二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华活动的比较 / 219
- 三 李佳白与“尚贤堂” / 224

**第十章 教会慈善事业 / 229**

- 一 教会医疗事业 / 229
- 二 教会慈幼事业 / 236
- 三 教会救济事业 / 239

**第十一章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 245**

- 一 记白宫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 / 245



## 目录

- 二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 / 249
  
- 第十二章 应付中国民族觉醒的新措施 / 258**
  - 一 天主教的“中国化” / 258
  - 二 基督教的“本色运动” / 265
  
- 第十三章 教会学校的新口号 / 276**
  - 一 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 276
  - 二 从山西大学堂到中华教育会 / 280
  - 三 教会学校提出应变新口号 / 286
  - 四 对三所教会大学的考察 / 300
  
- 第十四章 传教士与抗日战争 / 322**
  - 一 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 / 322
  - 二 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 / 327
  - 三 东正教传教士的活动 / 334
  
- 第十五章 战后三部曲 / 337**
  - 一 第一部曲：复兴 / 337
  - 二 第二部曲：应变 / 346
  - 三 第三部曲：撤退 / 350
  
- 附录**
  - 附录一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 359**
    - 一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 / 359
    - 二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 / 361
    - 三 《圣经》在中国的传播 / 367
    - 四 《圣经》对中国的影响 / 372

**附录二 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 375**

- 一 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 375
- 二 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 / 377
- 三 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 / 380
- 四 对《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关于基督教在华活动一章的评述 / 382

**附录三 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与存在的问题 / 387**

**参考文献 / 393**

**索引 / 413**

**顾长声著(译)作目录 / 429**

**后语 / 430**

## 第一章

# 传教士的东来

### 一 利玛窦身穿儒服上北京

1601年1月4日，利玛窦偕同庞迪我身穿儒服来到了北京城。他们受到明万历帝的优礼，在宣武门内赐屋居住，“所需皆由朝廷供给，每阅四月，颁赐银米，约合每月六至八金盾之数，足敷神甫们需用”<sup>[1]</sup>。

自从葡萄牙人同中国开始交通后，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于1540年要求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次年，教皇即派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东来。他先在日本传教，1550年谋入中国，于1552年10月乘船到达广东省沿海的一个名叫上川的小岛，向一中国商人请求用船送他到广州，但被拒绝，不久因病在岛上去世。<sup>[2]</sup>沙勿略是最早东来的天主教传教士。到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明嘉靖帝批准在澳门交纳地租建屋居住后，传教士就接踵而来，在澳门传教，招收中国人信仰天主教，凡入教者都要“学习葡国语言，取葡国姓名，度葡国生活，故不啻进教即成为葡国人也”<sup>[3]</sup>。传教士还以澳门为基地，向东南亚一带传教，“澳门已成为葡萄牙在远东势力的中心。

中国、日本和马来亚的传教事业，就以澳门为补给站”<sup>[4]</sup>。传教士还曾多次通过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向广东省中国官员申请到内地去传教，但都被拒绝。

到1581年，耶稣会又派遣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到澳门学习中文，准备进入内地传教。罗明坚先打扮成商人，跟随葡商到广州和肇庆，向地方官吏“赠送厚礼”，试探建立联系。1583年，罗明坚偕同利玛窦重至肇庆，向地方当局再次“送礼”，并请求允许在肇庆居住。他们向中国官员“请求一块小小的空地建造一处寓所和一座教堂，以便在那里念经和祈祷，隐居和默想。因为在商贾云集喧嚣杂沓的澳门是无法进行的”<sup>[5]</sup>。传教士的请求终于获得了同意。

利玛窦一人被留在肇庆，但他并没有过“隐居”生活，而是开始了传教活动。他穿上了和尚的法衣，称教堂为寺庙；为了能吸引人们到教堂，在接待室里陈列了从澳门带来的当时西方所制造的时钟、时晷、浑天仪等物；又在墙上悬挂了一幅用汉文标明地方的世界地图。利玛窦最初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他故意地“把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的位置转移，把中国放在正中。……这正是一种适合于参观者的脾胃的地图。众司铎相信，以后在演讲时，一定能有许多便利，来宾见到西洋各国与中国的距离几乎远得无法测量，又有重洋相隔，便不再畏惧有外力来侵略”<sup>[6]</sup>。

1589年4月，利玛窦又前往广东韶州传教。后来他又先后到广东的南雄、江西的南昌、江苏的南京和苏州等地活动，并与地方官吏和士大夫结交。利玛窦发现，在他与中国官方和文人交往的过程中，身披和尚袈裟反而有诸多不便。于是从1594年起，他改穿儒服，戴上儒冠，并自称是儒者。

利玛窦决意要到中国京城北京去，在取得了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的同意之后，由瑞士籍传教士郭居静从澳门领来经费和贡品到南京。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利玛窦带了另一传教士西班牙人庞迪我于1600年自南京出发，在天津羁留了六个月之后，终于在1601年年初到达北京。

通过太监的帮助，利玛窦向万历帝献物。

献天主圣像、圣母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大小二具、铁弦琴、万国图。皇上欣念远来，另见便殿，垂帘以观。命内臣习学西琴，问西来曲意。利子始译八章以进。后蒙赐问大西教旨及民风国政等事。于是钦赐官职，设僕三朝，宴劳利子等。固辞荣禄，受廩饩。上奉圣像于御前，置自鸣钟于御几，后命画工图形进览。……利子以旅人浮海东来，观光上国，住中华二十余年，颇识文字，与他夷来宾为名利者不同也。具疏请命，或两京，或吴越，乞示安插。礼部并为题复，未蒙报可。内官出谕利子曰：弗固辞，主上方垂意。若固辞，则上心滋不喜。于是礼部赵公邦靖周旋其间，利子始安意京师，偕庞子僦屋以居。至其日用饮食所需，取给于光禄，遵上命也。[7]

西班牙首批传教士是在 1575 年到达福建漳州的，曾要求居留学习汉语和传教，但未获准。到 17 世纪初，西班牙又陆续派遣少量传教士来华活动。[8]

17 世纪后半叶，法国殖民势力在海上上升为统治地位之后，第一批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有张诚、白晋等五人。他们于 1688 年到达北京，受到清康熙帝的召见并得到任用。最早由耶稣会派遣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是金尼阁，他于 1611 年到达中国。到 1773 年止，先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将近有一百人。

西欧各国在华传教士除一部分在宫廷供职外，足迹遍及中国本部十余省，平均每年约有三十名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据利玛窦自称：

我们耶稣会同入依照本会成立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发动这精神战争的第一人，便是本会的沙勿略神甫。……以后，耶稣会的诸司铎，带着满腔的热情，和葡萄牙人结伴而来。……这种冒险事业，经过了

种种阻挠之后，……在华耶稣会长范礼安司铎，决计派几位司铎在澳门学习中文，庶几有一天他们能找到门路进入内地。<sup>[9]</sup>

为了进行这场征讨中国的“精神战争”，传教士采取了利用中国儒家经典和介绍当时西方科学知识为手段。利玛窦于1595年在南昌写成了《天学实义》一书，第一次利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此书后改名为《天主实义》，1601年在北京重刻，1605年在杭州又重刻，以后曾再版多次，并译成多种外国文版。现引述该书一段以略窥其貌：

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年，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曰：“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祇。”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sup>[10]</sup>

利玛窦罗列了一大堆中国经籍的话，无非说明西方传人的天主教和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是相一致的，以此笼络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集团。他在向万历帝传教时曾说过：“上帝就是你们所指的天，他曾经启示过你们的孔丘、孟轲和许多古昔君王，我们的来到，不是否定你们的圣经贤传，只是提出一些补充而已。”<sup>[11]</sup>后来，利玛窦又编写了《畸人十篇》（1608年）、《辨学遗牍》（1609年）等书，都大量地引用了中国经籍。

继利玛窦之后，艾儒略也是大量引用中国经籍的耶稣会传教士之

一。他的著作有三十多种。例如在他所著的《三山论学记》一书中写道：

予读中邦史书，见成汤之禘于桑林也，剪发断爪，身婴白茅，以为牺牲。夫以皇皇天子，而匍匐以代牺牲，旁观者诚作何状？而汤竟忘其九五之尊者，其悯念斯民者挚也。今天主尊矣，监观下民，非不甚赫，乃尽敛其有赫之威，而受难救赎者，为古今万民也，为予也，亦正为君也。

艾儒略在其他著作如《天主降生言行记略》、《悔罪要旨》、《万有真原》、《涤罪正规》等书中，也都引用了大量的儒家典籍。到了清代，南怀仁所著的《教要序论》、《圣体答疑》，白晋所著的《古今敬天鉴》（又名《天学本义》）和孙璋所著的《性理真诠》等书，同样也引用了儒家典籍。

天主教传教士在内地各省发展教徒，也采用此法以迎合地方士绅的心理，排除传教的障碍，同时容许入教者维持传统的“祭孔祀祖”的习俗。因此，到清朝康熙年间，在华天主教徒已有十五万人左右，其中，耶稣会所招教徒约达十一万人。只是因为传教士内部从1631年起发生了所谓“礼仪之争”才使教会发展的速度减慢。

传教士采用的另一手段，就是介绍西方科学以达到在宫廷立足和传教的目的。利玛窦初到肇庆，就介绍数学、地理、天文等方面的知识以引起人们的好奇，然后取得机会结交朋友，转而论证天主教教义，引人入教。他到了北京之后，继续采用介绍和翻译西方科学知识结交朝廷王公大臣。他在北京住了十年，曾连续译著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圜容较义》、《同文指算》、《测量法义》、《经天该》、《万国舆图》等图书，其中有一些是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译。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传教，所以书中掺杂了不少宗教神话。例如，他在讲到天文学时就添进了基督教的地狱说，“地之中心有恶人受罚之地狱”等

等。在利玛窦写给明政府铨部大臣虞淳熙的亲笔信中，曾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窦〔利玛窦自称〕西陲鄙人，弃家学道，泛海八万里，而观光上国，于兹有年矣。承大君子不鄙，进而与言者，非一二数也。然窦于象纬之学，特是少时偶所涉猎；献上方物，亦所携成器，以当羔雉。其以技巧见奖借者，固非知窦之深者也，若止尔尔，则此等事于敝国库序中见为微末，器物复是诸工人造，八万里外安知上国之无此，何用泛海三年，出万死而致之阙下哉？所以然者，为奉天主至道，欲相阐明，使人人孝子，即于大父母得效涓埃之报，故弃家忘身不惜也。门下试思，八万里而来，交友请益，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耶？逃空谷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辽豕自多其异，窦乃极愿其同，则群豕果白，亦跫而喜之日也。肆笔无隐，罪戾实深，仰冀鸿慈，曲赐矜宥。悚仄！悚仄！<sup>[12]</sup>

利玛窦在北京期间，还把中国的儒家经典译成拉丁文向欧洲介绍，并编写了一部手抄本《中意葡字典》和一本《中国文法》，供欧洲人学习汉语之用。利玛窦在北京住了十年，于1610年5月11日病逝，明神宗下诏以陪臣礼葬于阜成门外。后人为了纪念利玛窦，曾将他在中搜集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写的文字汇编成《中国札记》和《中国书简》，于1910年在意大利出版。

继利玛窦之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也都以介绍西方科学和参与修历书为媒介传播天主教，在来华之前都学习一点这方面的知识，“盖此与中国传教事业有莫大之裨益也”<sup>[13]</sup>。参加修历书的有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后二人还出任过清朝钦天监官职。他们乘机在宫廷内进行传教，汤若望等“出入宫廷，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乘机言圣教道理”。到明末曾一度使官中信教者达五百四十名



之多。[14]

据后来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丁韪良对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宫廷修历书的评价说：

钦天监的观象台只观测月蚀一项，到时除焚香击鼓，以期惊走贪食的龙王之外，就无所事事了。那座观象台是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和南怀仁指导下建立的。……参观的人都叹其铸造之巧，实则毫无实用，里面没有望远镜，虽则伽利略的伟大发明与世人相见已一世纪有余，但是看来教会中人似乎从来没有用过。……钦天监的历书，我们的科学是自愧不如的，它不知道根据什么原理，把星宿的影响、好坏分得清清楚楚，结果把日子分成吉凶两种，由皇帝颁发出去，全国臣民一体遵从。[15]

尽管当时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播科学知识时掺进不少反科学的东西，但他们还是介绍了不少欧洲当时先进的科学知识到中国来。除了利玛窦译著的科学著作外，其他传教士译著的较重要的科学著作计有：

熊三拔译著：《泰西水法》六卷，后由徐光启收入其《农政全书》。

金尼阁著，王征译述：《奇器图说》。

邓玉函编著：《崇祯历书》一百卷（《四库全书》改名为《新法算书》）。

汤若望编著：《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远镜说》、《测食说》、《西洋新法历书》等。[16]

南怀仁译著：《神武图说》、《康熙永年历法》、《赤道南北星图》、《仪象志》、《坤輿全图》、《坤輿图说》等。

白晋、张诚译：《实用几何学》。

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合绘：《皇輿全览图》。

传教士所介绍的科学文化知识，归纳起来主要有天文学、兵工学、数学和地理学，尽管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填补当时中国的缺